

上海·天津·黃埔

我的青年時代

(下)

● 王元輝原著 · 吳端容校訂

與任覺五結伴出川

民國十年四月，任覺五所住成都聯合中學是四年制，行將畢業，他和幾位同學相約，要「出川」求學。目的地是上海，因為當時全國有名的大學都要在上海招考。他們同伴的有成都的鄭福源，彭縣的李國治，犍為的龍啟翔和屏山的王季甫，都和我相熟。那時，我因賭氣離開學校，也妙想天開，要求參加他們的行列，出川去上海。他們知道我曾經去過峨眉山，有些出門的經驗，歡迎我同行。

我們家裡無法給我去上海的路費，所以我回到灌縣城去告貸於朋友。有一位比較富有我的朋友鄧某，他允許借一百元給我，約定四年以後還他。離開師範學校以後，我不好意思回家，後來決心去上海，當然要回家拜別爸爸媽媽。爸爸媽媽對於我去上海求學之事，當然十分贊成。不過，他們不能在經濟上支持我，不無歉意而已。

拜別爸爸媽媽以後，我又按照與鄧某約

定的日期，繞道灌城取款去成都。到灌城會見鄧某，我才知道借錢之事業已告吹。原來和我略有嫌隙的甘某，知道鄧某貸款之事，他便從中百般挑撥破壞。鄧某為人懦弱，受不了甘某的威脅，他只好收回承諾，對我不起了。

我悻悻然返回成都。思來想去，始終想不通，「世界如此之大為甚麼只有一個茫茫上海才是我惟一的去處呢？」

行期已迫，同伴們約我去訂船。我同他們出東門到九眼橋邊的一個茶館裡，訂到一隻直到重慶的米船，艙面全由我們包租，不搭其他客人。老闆姓王，船伙五六人，都見到了。

行前，我曾把甘某破壞我向鄧某借錢的情形對任覺五講了，他加思索地回答我：「沒關係，到了上海再說。」

開船時，我們同行的只有三個人，李國治、任覺五和我。因為鄭福源說那一天的日子不好，不宜出行而退夥了。龍啟翔王季甫均已回家，約定日期分別趕到犍為和敘府來

搭船。老闆和船伙五六人都好打交道。

一路清風明月，三天到達樂山。船在樂山靠岸補充蔬菜等之際，有兩位三十歲上下的男性旅客，上船來要求搭載。王老闆推說船是我們包了的，要他們和我交涉。他們說是川軍第八師的人員，因公赴重慶，請求給與方便，因為樂山碼頭沒有其他立刻開重慶的船。覺五和李國治都沒有意見。我想，那樣寬的艙面只住我們五個人，似乎沒有拒絕他們搭載的理由。我允許了他們，好在他們只帶了一個晚上做枕頭的小包袱，沒有其他的行李。開船以後，王老闆才對我說：「請你注意，那兩位先生是『打滾龍』的啊！」我問他：「何以知道？」他說：「那有到重慶去，這樣遠的路，不帶行李的？」本來我看那兩位先生並無不是處，聽王老闆這樣一說，我卻忐忑不安了。一直到了犍為看見龍啟翔，到了敘府看見王季甫，我覺得我們有五個人可以對付得下他們了，我才放心。

過樂山，大雨連連，甚為涼爽。到敘府，岷江與金沙江會合，江水暴漲。過瀘州，

到松溉，雨更大、水更漲，船不敢開，老闆宣佈「紮水」。所有的船都紮水了。一連四五天，睡在船堆裡看下雨，實在無聊。後來雨是停了，而上游湧來的水漲，還要四五天才能退。我們便商定，起坡走路到重慶。聽說只有三天路程。

王老闆和我們算帳，彼此都很客氣。原來說伙食大家分攤，老闆出米，我們出菜，老闆不要我們的菜錢。我們的船資早已付清，付到重慶，現在松溉起坡剩下的那一段路的船資，我們也不要他退了。同伴們都很信任我，推我做他們的財務總管，一切費用由我統收、統支，到上海結帳。

準備起坡。我先去雇得兩乘滑竿，綁好行李，請同伴們押著行李上岸。我殿後，拱手拜別王老闆。那兩位打滾龍的先生，堅決要賴住和我們同行。我勸他們留在船上隨船到重慶。他們說：「王老闆絕對不容許」。我覺得他們有欺負我們而怕王老闆的嫌疑，我便決心和他們攤牌，乃猝然變色，拂袖而去。走了許久，不見他們追來，我才放心。其實，他們兩個人怎麼敢追來欺負我們五個人呢？況且，再加上四名滑竿伙一起算，便是九比二了。

繁華上海會見毛筠

走三天到重慶，爬上那一座巍然矗立的山城，進通遠門到蹇家巷，找到經人介定的一家商號。說我們運氣很好，明天就有船開

宜昌。老闆很客氣，不讓我們去住旅館，留我們在商號裡住一宵。他立刻就幫我們買船票。

想不到重慶有那麼熱！夜裡睡下來輾轉反側，彷彿在火坑裡打滾。商號是四層樓，每層都一樣熱，無處可逃暑熱。我們以為露天的頂樓上也許好一些，睡下來欣賞天街夜色。殊不知，那「三合土」製成的樓面，正在散熱，燙得背上起炮。

次日清晨，老闆親自送我們上船。出朝天門，遠遠望見江面上有一座「洋房子」，那就是當時稀有的川江輪船之一，「蜀亨」輪。當天到萬縣拋錨過夜，第二天早上拂曉開船。過白帝城，出夔門，過三峽，仰望巫山十二峯，黃昏以前就到了宜昌，正如李白所云「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也。

四名腳伙，領我們連同行李，上一隻划子，划到停在附近江心行將開往漢口的「武昌」輪。腳伙們把行李點交清楚以後，我在付腳力錢的時候，惹怒了他們，他們要打我。帳房先生立刻阻止了他們，把我請進帳房，問明情形以後，他說：「同鄉，你初次出門，不懂行情。你給他們那二十幾枚『當五』的四川銅版，在四川也值不到一塊大洋，此地根本不用。所以，他們認為你侮辱了他們。」帳房先生姓蕭，年近半百，他是灌縣附近的郵縣人，所以他稱我為同鄉。他要我聽憑他去處理這樁事，我只好接受。他為

我代付四塊大洋，留待買船票時一併結算。腳伙們仍是罵不絕口地勉強接受而去。後來聽說當時在宜昌船過船，連同划子錢，每個人還沒有花上一塊大洋，要那帳房先生才得到。

匆匆忙忙然到了漢口。下船時，我們初次見到人潮非常的擁擠，初次聽到都市的喧囂。漢口有碼頭，腳伙們上船來挑取行李，引著我們走到另外一個碼頭，登上另外一艘行將開往上海的輪船，比在宜昌省事得多。

三四天，日夜行，水平船隱。望洞庭影蠡，過金山焦山。到上海，接客先生上船來把我們引到法租界的江西旅社。

在旅社洗了臉，我和李國治兩個人出街瞻望上海的繁華。馬路上跑著叮噹叮噹的「房子」（電車）。我們發現接連有兩輛電車上標有「徐家匯」三字，因為我們經人介紹，到上海時去徐家匯南洋大學找余翔九，我們便上了電車。好在售票員能聽得懂我們四川音的徐家匯三字。車行良久，其他乘客都下了車，我們知道徐家匯到了，我們也下車。到南洋大學訪問到余翔九，他把我們送到染房弄一家宿舍，會見毛筠。毛筠也是聯中同學，他比我們先一個月到上海。毛筠同我們搭電車回到江西旅社，同伴們尚在驚駭中，他們以為我們失蹤了哩。

依毛筠的安排，我們第二天搬進染房弄那家宿舍住下來。我們出川之行就此告一段落。

行程既已結束，我應該提出財務報銷。他們都說：「不必了。」因為他們每個人付給我的錢，或多或少地都有一點剩餘，任覺五比較剩得多，也許他們都已知道我沒有錢，所以主張不算而結。

自修考上北洋大學

在上海候考大學的四川學生，只是我所認識的就有好幾十個人，要想考上一個比較有名的大學都很困難，因為當時四川中學的水準比較差，尤其是英文程度。開學以後，大半的熟人都進浦東中學去補習，準備明年再考。我們宿舍的七八位四川同鄉，包括我們同路的四位，也都進了浦東中學。我和毛筠同住一間屋子，共同燒油爐子煮飯吃，沒有進浦東中學，因為沒有錢繳費。

我決定自修，也準備明年考大學。我選定的目標是天津北洋大學。我想學工科。北洋大學是當時國內著名的工科大學之一。它是國立，如果我考進去，每年可以在灌縣縣政府領得一百二十元助學金，勉強夠用。但是北洋很難考，要考國文、英文、代數、幾何、三角、物理、化學等科。國文我無問題，英文、代數、幾何、物理，只須把學過的書本溫習一遍就可以了。三角全未學過，化學雖學過，也須全部重修。仔細研究之後，我訂下一個課程表，按表自修。

我每天拂曉起床，做健身運動。讀一段英文，朗誦一篇古文或三五首詩詞。上下午

各做四小時功課。新修三角和化學，我並不覺得困難。晚飯後經常有附近居住的朋友來談天。他們往往會帶一瓶玫瑰露酒和一包花生米來請我，要求我講故事。「俠隱記」（三劍客）和「八一三」（偵探小說）兩部書我記得很熟。我一面喝酒一面講，越講越有勁，聽眾們說是很過癮。

這樣的日子並不難過，只是房東來收討房租，和沒有錢買米買菜的時候，總有些著急。但是，只要借到小筆借款以後，馬上就把一切困難都忘記了。

同住的毛筠，經常焦眉愁眼，每天都睡到中午才起床，無所事事之時也睡在床上看陳年雜誌。我勸他打起精神自修。他說：「我的程度太差，再修也考不上大學，而且我早不知道這裡的大學有那麼貴，即使考上也無錢入學。」後來，住浦東中學的龍啟翔生病，住上海醫院，需人陪伴，毛筠就和我分手去上海醫院了。

我們的宿舍裡，樓上還住有一位四川同鄉，陳皓叔，樂至縣人，四川省立第一中學畢業，他一個人住一間屋子。毛筠去後，他就搬下來和我研究功課，同煮飯吃，他能燒一手好菜，如麻婆豆腐等。他知道我窮。他說他有錢，房租和買米等都不我去焦慮了。

寒假以後，陳皓叔搬到北四川路去參加一處的補習，我便去南京，因為南京的生活費用低得多，在南京住鼓樓與棧，我繼續

照表自修，只是早上取消了國文、英文的朗誦，晚上也沒有朋友來要求我講故事了。

暑假到來，高小同學黎光明到了上海，要我去和他同住，準備考大學，我又到上海住一個多月。考期一到，我們分頭赴考。考後，許久才接到通知。我和李琢仁都考上了北洋，黎光明考上東南，陳皓叔考上同濟，任覺五考上南開，王季甫考上同濟。其餘還有好幾十位四川的熟人，有些考上了其他大學，有些仍須明年再考。

陳皓叔知道我没有錢，他送我一百元的路費。我和李琢仁（行憲後曾當選立法委員，現健在台灣）同路，坐船到天津，探問到西沽，進北洋大學報到。我很快就辦了一份入學證明書，寄回灌縣。兩個月後就接到本年度的助學金一百二十元。在北洋，我不算最窮苦的學生。

民國十三年，我在北洋才住到第四學期，大時代到來，我就被「北洋大學革新運動」的洪流把我沖走了。

以下是我民國七十二年在台北憶記的「北洋大學革新運動」的一篇文章，曾登載於中外雜誌及時代文摘。

謠言四起山雨欲來

民國十三年國立北洋大學在天津郊外「西沽」，濱臨北運河西岸。冬天，河上結冰，同學們，尤其是南方的同學們，喜歡「撐冰船」和河東岸上的汽車賽跑，視為別開生

面的一項運動。校園是滿清時代「武庫」的舊址，佔地三四百畝。桃林遍佈，柳堤環繞，是天津人春遊的好去處。

北洋大學是當年國內幾個最著名的純工科大學之一，素以「古老純淨」著稱。同學們很用功讀書，一般人批評他們「兩耳不聞窗外事，只是埋頭讀死書」：實際上未必盡然。但是，學校當局卻真是以此為其教育目標。五四運動時代的新思潮，如求革新謀進步等等，北洋大學並未接受。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改組，革命思潮又澎湃起來，北洋同學似有所知，似無所知，而學校當局更是置若罔聞。

北洋同學有幾個「膳團」，早餐都有麵條。當麵桶拾進飯廳之際，熱氣騰騰，群蚰亂飛。「這是從來如此」，沒人敢說不對。

民國十三年春天，開學不久，從宿舍到教室的過道忽然在牆壁上出現「匿名條子」，批評伙食，攻訐伙食老閻。「南式膳團」首先撤換伙食老閻，推出伙食代表，認真監辦伙食。於是南式膳團的伙食大為改良，既省錢，又合口味，衛生情況也有所改進，同學們甚為捧場。那位南式膳團的代表妙想天開，到事務處去借油印機，想用來印膳費收條。這是自古所無之事。事務人員說要請示事務長。事務長說要請示校長。校長問：「借油印機幹嘛？」代表答：「借來印膳費收條。」校長略為考慮以後，允許了。他說：「可以，但是不能拿去做別用。譬如說，印傳單

、捧孫文或者是攻訐老曹（指曹錕）那就不行。」這位代表已經在學校住了兩年，這是第二次見到校長馮熙運先生。第一次是在頭一年丁家立博士（Dr. Tenney，光緒二十一年創辦北洋大學的美國人）蒞校，在歡迎會上看見過他。

自從有人在過道上張貼條子發表意見以後，過道上就熱鬧起來。幾乎每天都有人發表大作，從伙食問題討論到一般校政，甚至於對學校當局也多所指責：有些是匿名的，有些是署出真姓名的。同學們不似從前「老死不相往來的樣子」，大家接觸頻繁，好像有所醞釀。於是謠言四起。有人說，學校當局認為校中有「亂黨」。北洋已不寧靜，山雨欲來風滿樓也。

在有一天的晚餐時間，同學們相互傳達說：「晚飯後到大教室開會」，何事開會？何人召集？許多同學都弄不清楚。但是，晚飯後大家都到大教室去了。幾乎全體同學都已到達。大家便推舉高年級同學蔣國鈞當主席。開會後各同學相繼發言，盡情傾吐胸中鬱悶，揭發校中的缺失，提出革新校政的主張。他們口若懸河，熱淚盈眶，至為感人；沒有講話的同學都認為，他們所講的正是大家的心聲。大會開了兩小時。第一，決議發起「革新運動」。第二，推舉蔣國鈞、汪盛荻、于清文、王天元四位同學為全權代表，主持其事。第三，決議「請行將畢業的四年級同學從旁指導，不要參加實際行動」。第

四，決議經費由同學自行樂捐。當即開始捐獻。想不到平常以節儉著稱的北洋同學傾囊捐獻，當晚就捐得好幾千元。

第二天清晨，過道上「大清郵政箱」旁近，出現一面牌告；蔣國鈞、汪盛荻、于清文、王天元四位同學，以鼓動風潮糾眾罷課為罪名而開除學籍。此大清郵政箱，確是滿清時代遺留下來的東西，民國已成立十三年，北洋大學還保存著這樣的古董，見者無不詫異。那牌告剛掛出來不久，被歐陽繼統同學看見，立刻把它取下來摔成幾塊。大約半小時以後，又出來一面牌告，歐陽繼統以擅毀牌告的罪名而被開除了。四位代表見此情形，知道還有更嚴重的發展，乃立即派同學到天津法租界的佛照樓館去開房間，設辦事處，以便進行一切。

再過兩小時，忽然一隊武裝警察開進北洋大學。由事務人員持著照片，陪同警察到各宿舍搜捕代表。其時，王天元正在新宿舍二樓李琢仁同學的寢室中，李勸王就在室內躲一躲，他自己鎖門而去。警察到來時，其他同學說：「李琢仁昨夜沒有回來。警察下樓去了，李才開門讓王出來。黃德淦同學上樓來對王說：「宿舍門口已被警察把守，同學們出入都要被盤問。」他勸王立刻設法逃走，黃王二人一同下樓，到後面圍牆下，黃盡力協助，王翻上牆，跳出去。好在外面牆下有草叢，所以沒有受傷。王乃穿過一大塊的草叢，爬上天路，坐上「膠皮」（天津人

氣憤填膺北京請願

呼黃包車爲膠皮)，直奔佛照樓而去。

入夜，所有同學，除四年級而外，都陸續來到佛照樓。大家氣憤填膺，決定一齊到北京請願，請撤換校長馮熙運，不達目的誓不返校。有些南開大學的同學聞訊，來到佛照樓慰問他們的親友。其中有一位老成持重的同學，對他們的親友講：「馮熙運是曹錕（北京的總統）的親戚，王承斌（直隸省長）已公開插手，派出武裝警察，這問題就嚴重了。」北洋同學已聽不進這些洩氣的論調，大家決心一往直前，成敗利鈍，在所不計。當夜就分批陸續搭火車去北京了。

第三天下午，同學們列隊在北京教育部門前請願，要求見教育總長。教育部收了請願書，說總長不在部裡。守衛的警察陸續增加了好幾名。同學們一直等到夜裡，才議決各自散去，分別找親戚朋友處棲身，無親戚朋友者找公寓暫住。

第四天下午，同學們又在教育部門前排隊候見教育總長。教育部答復如前，只是門口又增加許多持槍上刺刀的警察而已。同學們還是挨到夜裡才散去。

第五天，警察居然已把同學們的住處調查清楚，剛剛天亮，就分別去拜訪他們，要他們回天津去。一面勸導，一面脅迫。而且要他們立刻上火車站，可以說是陪同，也可以說是押送。火車站早已備好三節車廂，等

同學們完全上車以後，將車廂掛上列車，就向天津開去了。車開以後，同學們才發現車上並沒有警察。於是，到下一站，他們又買票上車轉回北京去了。同學們轉回北京以後，依然分別匿居，只是借一枚北京學校的校徽別在胸前，以防警察盤問而已。

又過兩三天，天津傳來消息，武裝警察仍然盤擬北洋大學未去。馮熙運校長又發了一個「榜」，又有二百幾十位同學因罷課離校而被開除。同時有一面牌告：「脅從者得具呈悔過書申請復學」。

北京各報紙對於北洋同學深表同情，盡量批露有關新聞，有好幾家報紙著社論譴責馮熙運處置失當，對於王承斌以直隸省長立場，用武力干涉國立北洋大學學潮，尤其大爲抨擊；並批評教育部不應坐視不理，更不應唆使警察脅迫北洋同學回天津，妨害其居住自由。北京各大專同學對北洋同學十分同情，不時派代表慰問，竭力協助一切，且演劇募捐予以經濟上之支援。北洋同學自己也發行刊物，名爲「革新運動」，以爭取社會同情。

爲了要呼籲國會的援助，同學們派出代表，尋求關係，分別奔走於國會議員先生之門。他們初次接觸到北京政壇的人物，感到詫異。許多議員先生不守時間，到了約定時間去拜訪，他們尚未起床。有些議員先生在談話時吐出極濃厚的鴉片煙氣味。但是，他們表情很誠懇，對於北洋同學的遭遇十分關

切。請他們提案咨請撤換馮熙運校長，他們都說極願盡力而爲。國會總算幫了忙，曾經提案咨請內閣轉飭教育部從速解決北洋大學風潮，然而，教育部仍然沒有絲毫反應。

開了兩三個月，同學們長在親友處作客，諸多不便。錢用光了，生活大成問題，已是夏天，同學們還有穿冬天衣服的。有幾位同學每天都吃肉絲燴火燒，因爲那家店可以除帳。有幾位同學住在北京大學西齋，也是因爲附近的小店能除帳，每餐都吃豆漿麵包。這樣顛沛流離，逼著他們進軍教育部。

有一天，下午兩點鐘，有四位北洋同學，脖子上纏著綠色手巾，騎著腳踏車在教育部附近逛一逛之後，齊集教育部門前，把口哨一吹，掩蔽在附近的同學們，一齊用跑步蜂湧上前。當時教育部只有兩三個守衛的警察抵擋不住，他們便排撻而入。部內的官員工友連同守衛的警察全部從後門溜之大吉。同學們發現教育部的大禮堂相當寬大，適於他們團聚棲身，乃決心長住下來。

不久，一隊武裝警察開來，排列在大禮堂門前。這是同學們早已預料到的事。他們乃推舉代表出去向警察訴說一番：「我們是從天津到這裡來請願的學生，不是強盜、不是土匪。我們要在這裡候見教育總長，待他把我們的問題解決之後，我們就出去。你們用不著管我們。你們如果要趕走我們，我們就要一齊和你們拼命。」同學們大家齊聲高呼：「我們一齊和你們拼命！」後來，警

察退到相當遠的距離。大概教育部已默許同學們在此長期住紮了。

各大專同學派代表來慰問。親友們送來大批麵包、餅乾、汽水等食物及枕頭被蓋一類的寢具，食住問題大體解決了。

依依不捨洒淚而別

就是這樣又鬧鬧嚷嚷地差不多過了一個月，忽然教育部派人傳話，說王正廷先生請代表們到鐵獅子胡同去談話。王先生是北洋大學的老同學，從前的外交總長，那時的中俄交涉督辦。

代表們按時到鐵獅子胡同，請見王督辦。那門房把代表們的衣著端詳一番之後，很誠懇地說：「太抱歉了，督辦剛出門到六河溝去了。」正說之間，裡面出來一位先生連呼「請進」。那位先生把代表們請進一間客廳之後，說他姓呂，王先生派他招待代表們。他說：「CT王現在正接待其他客人。CT王真是座上客常滿啊！」不多時，呂先生陪同代表們到小辦公室見到王正廷先生。王先生對於北洋同學十分關切，慰問有加。他傾聽了代表們詳盡的報告之後，他說：「我對於問題真象，已十分瞭解。讓我同各方面研究之後，我們再談。此後，請你們多同呂先生聯繫。」

同學們的意見透過代表，王先生的意見交代呂先生，幾次往返磋商之後，有了結論。王先生的意見是勸同學們先行回校，再換校長

。同學們的意見是，先行撤換校長才回校，而且要全體回校（包括代表），絕不具悔過書。

又過兩三天，王先生又約見代表們，他仍堅持「請同學們先行回校。馮校長是必然要換的。教育部也有它的苦衷，找一位大學校長也不是三五天辦得到的事體。」最後，王先生又說：「全體同學回校，不具悔過書，教育部已同意。還是要請各位同學先行回校，最短期間撤換馮校長。」

王先生的意見，當晚經全體同學研討之後，勉強接受了。王先生第二天宴請代表們於長安飯店。在座除呂先生外，還有教育部次長秦汾先生（也是北洋老同學），及幾位教育部的高級官員：據說，教育總長張國淦因病不能來。王先生即席宣佈幾天來和代表們討論的經過與乎協議的內容，代表們特別強調補充：「同學們要全體回校，不具悔過書，一個月內要撤換馮校長。」在座的秦次長和其他幾位官員，都一一首肯。王先生且說：「明天我派呂先生陪同同學們回去。」大家一致鼓掌。

同學們在呂先生的陪同下離開那早晚都晒大太陽的圓形大禮堂，到火車站。親友們到車站揮手道賀送別，祝同學們勝利回校。

車到天津，佛照樓聯絡處的同学迎上車來，說：「學校裡今天新開到一大隊武裝警察，戒備森嚴！」同學們相顧愕然。呂先生也頗為驚異說：「CT王說已取得王省長同

意的呀。」同學們挽著呂先生一齊去到佛照樓。呂先生以王儒堂（王正廷別號）先生代表的名義，以電話請示於王承斌省長。王承斌的聲音在電話聽筒中甚為震怒。他說：「他們回來了嗎？在北京拖幾個月，丟盡了我的臉。這樣的學生還讓他們回來，只有請儒堂先生來當校長好了。」經呂先生向王承斌婉陳良久之後，王承斌說：「那些被脅迫離校的學生，姑准他們具悔過書，聽候核辦。至於那幾位代表麼，請他們到省長公署來，我要看看他們是甚麼模樣。」同學們說被呂先生騙了，要打他。經好些同學勸阻，才把他放走。這位呂先生脫險以後，立刻打電話來責備同學們，他說同學們「太不禮貌」。

至此，淳厚而勇敢的北洋同學不能不承認「事已盡頭」。但是，他們有「打落門牙和血吞」的勁兒，不怨天、不尤人，很理智地作了一個決定。「有些同學，因家庭和環境的關係不能離開天津，請他們回學校去，我們都諒解他們。有些同學不願回去的，我們派代表到南京上海各處去接洽轉學，請他們回家去等候通知。」大家還依依不捨地相挽在佛照樓，再同住三天，才洒淚而別！

這已經是暑假期中。派到南京去的代表，首先去拜會東南大學工科主任茅先生。茅先生很同情北洋同學，允許所有被開除的北洋同學轉學東南大學工科。而且由工科發給入學許可通知（油印的蓋有工科印章）。幾

天之後，東南大學校長郭秉文先生「宣佈工科停辦」，茅先生自己也要走路了。這時候，江浙戰爭爆發，南京、上海、杭州等處都無活動了。

有朋友自廣州來信，說廣東大學校長鄒魯（海濱）先生奉孫大元帥之命收容所有這次在風潮中被開除的北洋同學。但是，當時的廣東被一般人視為另一天地，結果到廣州進廣東大學的只有兩個人，歐陽繼統與王天元。

後來，回到北洋的同學不及半數。其餘的或轉他校，或輟學就業。流落天涯而不知所終的也大有人在！

在暑期中，聽說馮熙運果然被撤換了。

黃達權資助入廣大

黃達權，四川巴縣人，張誦三，四川彭山人，這兩位同鄉，民國十三年住在北京候考大學。他們對於北洋大學學潮很關心，各報紙所載有關新聞，他們都密切注意。他們並不是北洋同學的親友，不過是對於北洋同學們的革命精神十分贊佩而已。暑假中，他們去廣州進廣東大學，路過南京，打聽到我的住處特地來拜會我。黃達權談話極坦率，他說他家裡相當有錢，他父親允許他分出力來幫助朋友，他特地來送我五十元零用錢。他們去廣州不久，來信說，廣東大學校長奉命收容北洋同學。後來在廣州我和他們成為極要好的朋友。——達權在廣大只住兩年

，北伐時期，以文學生投筆從戎病歿軍中，年僅二十餘歲。惜哉！

我和北洋大學同班同學歐陽繼統到廣州，晉見廣大校長鄒海濱先生，受到他的嘉慰。廣東大學沒有工科，我們被編入物理系三年級。

商團之役哪，第一次東征，河婆之役哪，第二次東征，惠州之役哪，回師廣州，肅平揚劉之役哪，……鬧轟轟地在革命怒潮中蕩漾了一年多，我又被國民革命的洪流捲進黃埔陸軍官校去了。

參加學生軍受訓練

民國十三年，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成立之初，只有學生五百人，步槍五百枝。當時號召打倒帝國主義及軍閥的革命領袖孫大元帥中山先生只有廣州市一個小小的革命地盤。英國匯豐銀行的買辦陳廉伯，在廣州成立商團，擁有精良武器，企圖顛覆孫先生的革命政權。

十三年八月，商團在香港所購軍械由丹麥輪船運往廣州，被黃埔軍校截獲。陳廉伯恃有英國政府及叛軍首領陳炯明為後台，公開煽動廣州市民罷市，要挾發還其軍械。雖然當時廣州市駐有好幾省的總司令，大半都是徒有革命之名而依然是割據軍閥的作風，各人分據幾條街，經常包煙、包賭、抽稅以自肥；他們對於商團事件漠不關心。

大元帥孫中山先生，以革命基地斷不容

小醜跳梁，乃毅然命令黃埔軍校校長蔣中正，於十月十四日，親率全校師生（此時已增至千餘人）圍攻商團盤據之西關。激戰一晝夜，商團全部繳械。這一批初出茅廬小試牛刀的黄埔學生，被當時廣州市民稱做「學生軍」。後來，蔣校長率軍征討盤據東江的陳炯明叛軍，先聲奪人，節節勝利；東江民衆對於蔣校長所率領的黄埔學生隊，及軍校的教導第一團與第二團（由商團之變所俘獲的軍械而成立的）都稱為「學生軍」。

民國十四年五月卅日，上海民衆因抗議上海日本內外紗廠慘殺華工而舉行示威遊行，經過英租界的南京路，英國軍警為日本人撐腰，開槍射擊遊行群眾，死者數十人，是為「五卅慘案」。六月二十三日，廣州民衆七萬餘人，舉行遊行示威，聲援上海民衆；行經沙基時，幾十公尺外的沙面（英租界）英軍，無端開槍掃射遊行群眾，死百餘人，傷者無算，是為「沙基慘案」。當日遊行群眾有黃埔軍校學生，廣東大學及其他大專學生，廣州市中等學校學生與一般民衆。筆者當時參加廣東大學行列。當槍聲忽然響起的時候，我不知所措，發現一家米店正在關閉鐵門，乃同幾位同學擠進米店，躲在米袋後面，靜聽槍聲。後來又聽見停泊在白鵝潭的外國軍艦也開了炮。大約一小時後，槍炮聲沉寂下來，米店老闆才引導我們從後門出去，奔回文明路廣東大學。

同學們驚魂甫定，齊集大禮堂開會。大

家氣憤填膺，一個個磨拳擦掌，但發言盈庭，莫衷一是。教授黃季陸先生站上講台高呼：「這是應該由我們的政府向英國政府與師問罪的事件，我們到大元帥府請願去。」同學們一聞而散，衝出校門，齊赴粵秀樓大元帥府。

這時候，孫大元帥中山先生已於三月間逝世，胡漢民先生代理大元帥。胡先生講話，嚴肅而誠懇。他對同學們的愛國熱忱十分嘉許。他說：「我們一定要打倒英帝國主義者，為死難同胞復仇。」他盼望同學們勉抑悲憤，專心求學，儲為國用。

離開粵秀樓回到學校，同學們仍然鬧鬧嚷嚷，餘氣未消。有幾位同學忽然感到「手無寸鐵、難以報國」之苦，倡議組織「學生軍」。大家立即推舉代表去見校長鄒海濱先生。鄒先生十分贊同，允商請黃埔陸軍官校幫忙辦理。鄒先生商得軍校同意之後，立即指定部份宿舍做營房；同學們則興高彩烈地推出代表，展開籌備工作；洽製軍裝、打掃營房，到黃埔搬運槍彈。

這時候已到暑假期間，許多同學已回家，報名參加學生軍的不到兩百人。也有幾位其他學校的同學經校長許可而來報名的。我在台北遇見立法委員彭震寰先生他也參加過學生軍，他好像當時是香港學生。全部學生軍組成一個隊。隊長是軍校第一期畢業的李樹森先生。隊分為三個區隊。區隊長是余程萬先生等。每區隊分為三個班。班長由隊長

在同學中挑選，總教官是何應欽先生，何先生教軍制，錢大鈞先生教兵器，劉峙先生教戰術。

同學們對於「軍隊生活」感到十分新鮮。早上，起床號剛吹完，接著就是值星區隊長的哨音，教大家立刻起床，整理內務，打綁腿。正忙著洗臉漱口之際，又來一個哨音：集合到操場練跑步，五分鐘、十分鐘、十五分鐘，逐漸增加到每天半小時。每天三操兩講之餘，晚點名聽了值星官的訓話之後，馬上就要上床。再沒有人「吊耳郎當」地拖著木板鞋出校門到麵攤上去吃雲吞麵的了。星期日要擦槍。要檢查內務。不合格的不得休假。最使同學們感到好玩的是實彈射擊與打野外。何應欽先生不時親到操場來督練，很細密地指導班長的示範演習。

晒了四五十個夏天的廣東太陽，同學們臉上的皮脫一層又一層，甚而至於背上也晒脫皮了。有一位同學說：「我全身都沒有『文皮』（文學生的皮）了」。

暑假結束以後，學生軍的訓練也結束了，大家依然註冊上課，這一年的秋天，學生軍的同學們有好幾十位離開廣東大學去投考黃埔軍校。我在台灣遇見的林樹恩先生，婁紹鑑先生與涂思白先生，都是參加學生軍以後才進黃埔軍校的。

回家省親見到媽媽

十五年北伐，我被甄選參加戰時宣傳大

隊（由黃埔軍校四五兩期學生挑選，講習一個月）隨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出韶關，翻五嶺，過衡陽，到長沙。我被分發到第二師。經過汀泗橋和賀勝橋兩個激烈戰鬥，進攻武昌。

第二師由總司令親自指揮，轉江西，攻南昌未克，退渡贛江至奉新。十月，又由梅花嶺攻牛車車站，克南昌。不久，第二師又奉命轉戰浙江，攻下龍游，長驅直入杭州。十六年春，第二師由嘉興攻入上海後，我即請假離開部隊準備回家省親。

十七年，我同黎光明兄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先生派赴川西北調查民俗。

回蒲村，見到媽媽。她康健如昔日，仍然住在火燒後搭建的房子裡！爸爸仍然時常在外奔波，家務仍全由媽媽操持。我回家時穿著西裝，鄰居對我說「恭喜你發了財。你媽媽還住在破房子裡。」媽媽立刻表現怒容說，破房子與你有甚麼相干？我有一個發財的兒子，未必不該？「媽媽很信神，我離開她以後，她從不以我的平安為憂慮。她相信她的兒子時時都有神保佑。灌縣城謠傳我在北伐時被打死了，她毫不置信。她對於神的信仰發生了無比力量，所以，我離開她以後若干年，她還是生活得很開心，身體仍然很康健。而且，她已經使我的妹妹王仲輝讀了好幾年書，體力練得很強健，她要我把仲輝帶到成都去唸中學。」